



學習蘇聯編製與實現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

李 津 恆 著

財政經濟出版社

學習蘇聯編製與實現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

李聿恆著

財政經濟出版社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先分析了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政治和經濟形勢，根據這種情況的分析，進一步說明了怎樣進行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準備工作，確定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進度、它們的比例關係、最高方案與最低方案，以及和計劃工作中資產階級觀點作鬥爭的情形，然後又闡述了蘇聯人民怎樣為完成並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頑強鬥爭以及這一鬥爭勝利完成的歷史意義。

— 我們國家正在進行有計劃的建設，這樣的讀物無疑地可以幫助我們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

———— * 版權所有 * ————

學習蘇聯編製與實現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

定價 2,700 元

著者：李 聿 恆

出版者：財政經濟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印刷者：中國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口路七七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分類：財政·經濟 編號：0160
54.11，京型，38頁，46千字；787×1092，1/32開，2—3/8印張
1954年11月上海初版 印數[總]1—8,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零八號)

目 錄

引言

第一章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幾個草案的主要缺點。布爾什維克黨

反對計劃工作中資產階級觀點的鬥爭

五年計劃的前幾個草案的主要缺點 布爾什維克黨反對計劃工作中資產階級理論

「下降曲綫論」「計劃——猜測論」「平衡論」「農業主導論」「運輸業主導論」

「以銷定產論」「極限論」——的鬥爭 布爾什維克黨反對計劃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方

法——「靜態係數法」「動態係數法」「具體比較法」「專家估計法」——的鬥爭

第二章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方法及其內容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擬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

五

六

三〇

關於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法的指示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 五年計劃的主導環節 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計劃的編製 五年計劃中的社會化綱領 勞動、財政計劃的編製

第三章

布爾什維克黨領導蘇聯勞動人民爲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爭……………六七

降低工業、建築業成本的主要措施 社會主義勞動競賽 斯大林同志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能夠勝利完成的基本原因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的巨大政治經濟意義

引言

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是有計劃地進行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決定性的關鍵。爲了編製和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應當學習蘇聯計劃工作的先進經驗，特別是學習蘇聯編製與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並充分考慮到我國的具體情況，以便把蘇聯的經驗有效地運用到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去。

第一章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幾個草案的主要缺點。

布爾什維克黨反對計劃工作中資產階級觀點的鬥爭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編製過程中曾改變了十次，歷時四年（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前幾個五年計劃草案的主要缺點，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沒有按照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把發展重工業放在國家工業化的首位。例如，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個草案中，規定重工業部門的發展速度為百分之九十點四，輕工業部門的發展速度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三。這樣兩種發展速度之間的比例關係，對於建設蘇聯的重工業來說，是很不夠的，因為重工業的原有水平較輕工業的原有水平落後很多。爲了對比起見，我們就以金屬工業與紡織工業的投資情況爲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金屬工業部門的投資額是十五億八千萬盧布，紡織工業部門的投資額是七億八千萬盧布，乍一看來，似乎這種投資額的分配已予優先發展金屬工業以適當的考慮，但如果估計到計劃期初這兩個部門的原有水平，事情就不是這樣。根據估價，計劃期初金屬工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是十一億八百萬盧布，而紡織工業部門的固定資產却是十四億一千萬盧布，這樣，按照上述分配投資的結果，在五年計

劃期末，金屬工業部門的固定資產，只能與技術上落後的紡織工業部門的固定資產取得近似的水平。按照這個五年計劃草案的規定，計劃期末重工業在全國工業總生產量中的比重只佔到百分之四十五點一，而輕工業的比重反而佔到百分之五十四點九。

顯然，按照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這樣一種比例關係，是不可能建立起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的。聯共(布)中央指出了這一錯誤，並且提出了消除這種錯誤的建議。

第二，在五年計劃的前幾個草案中，沒有在很大程度上考慮到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迅速增長；沒有提到在工業中絕對地縮減私人資本主義成分這一任務。在商業方面也是如此。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個草案中，規定五年計劃期末的私營商業流轉額為四十五億五千萬盧布，而在第二個草案中，則把這項流轉額規定為五十一億四千萬盧布。這些計劃草案的編製者認為：如果私商能夠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和條件來推銷商品，那末，他們實際上即將變成國家的單純的代理人。他們以為私營商業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和平地生存下去。聯共(布)中央嚴厲地斥責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想法，強調地提出了迅速發展國營工商業的任務。

第三，在五年計劃的前幾個草案中，雖然包括了許多農業方面的計劃，但沒有提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根本性問題。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個草案中，編製者認為：農業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改造時期，並不是在於這五年，而是在以後五年；在這五年中，農業方面的基本任務，只在於創造高度的農作物生產量。按照這樣一種錯誤觀點，於是，在編製農業生產計

劃時，就局限於預測五年中間農業的小商品生產將如何自發地發展。

聯共(布)中央斥責了這種把提高農業生產力與改造小農經濟的生產關係機械地分割開來的錯誤說法，並強調指出：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提高農業生產發展速度上有着巨大的作用；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與改造小農經濟的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關係，兩者應該密切結合，同時進行。

第四，在五年計劃的前幾個草案中，規定着國民經濟發展的低速度，而且是逐年下降的。五年計劃各次草案中所定的工業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如下(見第九頁)：

不僅在工業部門中，而且在農業部門與運輸部門中也規定了這一種發展速度逐年下降的方案。

斯大林同志批判了這些逐年下降的方案，指出了這些方案是以托洛茨基的反動的「下降曲綫」理論為依據的。

綜上所述，可見五年計劃的前幾個草案的基本缺點在於未能很好解決國民經濟改造時期的兩個基本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國民經濟社會化；沒有保障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低地估計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可能速度。一句話，五年計劃的這幾個草案，沒有能很好反映當時聯共(布)中央所規定的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那些呢？

五年計劃的各種草案	對上年度的百分比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百分比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百分比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百分比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百分比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第一個草案(一九二五年)	—	—	—	—	—	—	—	—	—	—	—	—	—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第一個草案(一九二六年三月)	—	—	—	—	—	—	—	—	—	—	—	—	—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第二個草案(一九二七年三月)	—	—	—	—	—	—	—	—	—	—	—	—	—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第三個草案(一九二七年一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第一個草案(一九二七年一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第二個草案(一九二七年一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總制數字(一九二七年一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指令(一九二七年五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第三個草案(一九二八年八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第四個草案(一九二八年三月)	—	—	—	—	—	—	—	—	—	—	—	—	—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最低方案	—	—	—	—	—	—	—	—	—	—	—	—	—
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最高方案	—	—	—	—	—	—	—	—	—	—	—	—	—

除了沒有經驗、缺乏完整的統計資料這些原因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在當時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中，有着爲數不少的資產階級專家，他們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方法在實際工作中起着破壞作用，使前幾個計劃草案都不能適應黨與政府的要求。

計劃工作上的資產階級觀點主要表现在下列幾個方面：

首先是托洛茨基分子的「下降曲綫論」。這種「理論」認爲工業發展的高速度只有在恢復時期才有可能，恢復時期一經結束，工業的發展速度就會逐年下降。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論根據」是：固定資產的投資速度是逐年減少的，投資速度的減縮會決定生產量增長速度的降低。實際上，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工業化初期的生產增長速度，不僅決定於新增的固定資產，而且更主要地決定於原有企業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四分之三的工業產品就是由原有企業生產出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沒有看到勞動人民的生產熱情，沒有看到原有企業在建設初期的重大作用，片面地作出發展速度下降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反科學的，因此也是反動的。它阻礙着國家工業化事業的迅速開展。上述五年計劃的前幾個草案規定工業發展速度的逐步下降，即是受到這種反動理論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給予這種反動理論以殲滅性的批判。他指出：「有一種理論，它認爲高度的發展速度只有在經濟恢復時期才是可容許的，而從進入改造時期起，建設速度便應當一年比一年銳減下去。這個理論叫做『下降曲綫』論。這個理論是一種辯護我國落後狀態的理論。」

它是與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是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這是打算要把我國落後狀態永遠保留下去的資產階級理論。……顯然，假如我們沒有把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的『發展下降曲綫』論粉碎，那我們就會不能展開真正的計劃工作，也不能提高建設速度和縮短建設期限。爲要領導實現黨總路綫的工作，爲要修訂和改善五年建設計劃，爲要提高建設速度和防止建設工作方面的種種錯誤，首先就必須打破和消滅反動的『發展下降曲綫』論。」^①

斯大林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分子只看到建設時期固定資產的磨損，只看到固定資產更新的長期性，而沒有看到建設時期固定資產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沒有看到建設時期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

斯大林同志指出：即使在建設時期，高速度地發展經濟也完全是可能的，雖然建設時期的生產量比前一時期多了很多。當然，在一般的情況下，由於基數的提高，每百分之一所代表的數字要比過去大得多，因此，建設時期的工業發展速度可能低於恢復時期，但必須強調指出：這不是一種法則，更不是什麼『下降曲綫』法則，蘇聯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例如，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工業發展速度就達到並超過了恢復時期的發展速度。

托洛茨基分子這種企圖阻礙社會主義工業化迅速開展的反動理論，被以斯大林同志爲首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〇五和第一〇九頁。

的聯共(布)中央粉碎了。

其次是巴扎洛夫的「計劃——猜測」論。巴扎洛夫認為計劃就是對未來經濟活動的一種「猜測」。他否認計劃的科學性質，否認我們的計劃是以客觀的經濟法則為依據的，是以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理論為依據的。巴扎洛夫只熟悉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沒有看到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化基礎上所產生的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這一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成為可能。

巴扎洛夫的這種歪曲計劃本質的反動理論，企圖降低計劃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巨大作用，企圖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方面的領導力量。

聯共(布)揭露了這一「理論」的反動本質。斯大林同志指出：否認社會主義計劃的科學性，就是否認任何預見的可能性，也就是否認國家領導經濟生活的可能性，因為沒有科學的預見，就沒有領導，而無產階級國家如果不對國民經濟進行有計劃的領導，那末，社會主義經濟就會分崩離析，走上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老路。

巴扎洛夫受到批評以後，並未改正他的錯誤，反而以另一種改頭換面的形式來代替上述業已破產了的說法。這一種新形式是：「計劃既是猜測，又是法令。」這樣一種機會主義的說法，居然對當時某些黨內同志起了一些蒙蔽作用。於是，聯共(布)中央又不得不進一步來批判這一種反動的資產階級理論。聯共(布)中央指出：在巴扎洛夫這種新的說法上，雖然加

上了「法令」一詞，但在本質上與他過去「計劃就是猜測」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因為「猜測」與「法令」，是矛盾的，是不可能調和的。黨與政府的法令政策，都是以客觀的科學的社會發展法則為依據的，而不可能帶有任何猜測的因素；反過來說，凡是猜測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成為法令。巴扎洛夫把猜測作為計劃屬性的第一位，那就排斥了計劃的法令性質。猜測與法令這二個概念是不可能在同一的客觀事物上存在的。

正是由於在蘇聯計劃工作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曾出現過這種「計劃——猜測」的反動資產階級理論，因此在以後就特別強調「國家計劃就是法律」這一原理。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這一原理作了經典式的說明：「我們的計劃不是預料式的計劃，不是猜測式的計劃，而是法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是各個領導機關必須遵照執行，因而能決定我們經濟在全國範圍內將來發展方向的。」①

在目前我國計劃生產的實踐中，「國家計劃就是法律」這一觀念，至今並未為所有企業領導者和一般職工所了解，並牢固地樹立起來。去年瀋陽「東北日報」揭露了電工十五廠一連九個月沒有完成國家計劃，妨礙了國家一部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如僅由於該廠一項主要產品高壓開關板（變電所中一種重要設備）未能按時出廠，就嚴重地影響了鞍山鋼鐵公司、東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三頁。

北電業管理局、西北某水力發電站等四十五個單位的某些重要基本建設工程和生產的進行。

我國目前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增加了計劃的複雜性和困難程度，這種困難主要來自私人資本主義和分散的個體經濟兩方面，它們不容易接受監督，對於國家計劃具有自發的抗拒力量，隨時都想越出國家計劃軌道，自由發展。通過委託加工、定貨、包銷、統購及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通過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通過國家的價格政策等等，把它們逐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將是整個過渡時期計劃工作的主要鬥爭任務之一。過分強調這些經濟成分與計劃的矛盾，甚至認為國家統一計劃不應核算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的觀點，是錯誤而有害的。不過我們的計劃，對私人資本家來說和對農民來說，並不具法令性，只是對於各地、各部門領導機關，對於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來說是法令性的。

計劃工作上的第三種資產階級理論是「平衡論」。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對發展重工業，認為應該保持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原有比例關係，保持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原有比例關係。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可以和平相處，不相抵觸。

平衡論者的理論根據是：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應該保持一定不變的比例關係，如果破壞了這種原有的比例關係，經濟發展過程就會發生不平衡的現象。因此，他們不主張發展重工業，因為發展重工業就要改變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從而會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不平衡。

現在，我們進一步研究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要保持的比例關係是怎樣的一種比例關係吧。斯大林同志揭露了這一問題的實質。他指出他們要求保持不變的比例關係原來就是沙俄時代的比例關係，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的比例關係，這是落後的農業國家的比例關係，這是一種經濟上不能獨立而要依靠外國資本的比例關係，這種比例關係的性質是農業的比重大於工業，輕工業的比重大於重工業。保持這種比例關係不變意味着什麼呢？斯大林同志進一步指出：這就意味着不要建設社會主義，而仍然回到資本主義的老路，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業的比重應該大大超過農業，重工業的比重應該超過輕工業。

由此可見，「平衡論」的反動本質就在於主張資本主義的復辟，反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改變原有的工業與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例關係，是否真會形成國民經濟的不平衡呢？要解答這一問題，就必須首先搞清楚什麼是平衡。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理論，平衡只能是動態的平衡，而不是靜態的平衡；平衡只能是相對的平衡，而不是絕對的平衡；平衡只能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在發展過程中的平衡，而不是抽象的不變的平衡。斯大林同志在批判上述所謂「平衡論」時指出：「只要打開馬克思主義寶庫，拿出再生產論來和各部分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把這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了。」⁽¹⁾

(1)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三七九頁。

這種機會主義的「平衡論」與我們目前應用的編製國民經濟計劃的基本方法——平衡法——毫無共同之點。一個最基本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平衡法是以唯物辯證法爲其科學基礎的，認爲一切平衡都是事物運動發展過程的平衡；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平衡論」則是以形而上學爲基礎，認爲一切平衡的本質就是靜止不變。

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文中，第一段就是批判這種「平衡論」。斯大林同志首先批判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可以和平共處而不相抵觸的那種機會主義說法。他指出：「共產黨員中間至今還存在有說我國國民經濟各部分彼此『平衡』的所謂『平衡論』。這個理論當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處的。……按這個理論說來，我們這裏似乎是有兩個木桶，一個木桶裏裝着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另一個木桶裏却裝着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兩個木桶循着彼此平行的軌道，並排向前滾去，和平共處，不相抵觸。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綫是不會交合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的創作者却認爲這兩條平行綫總有彼此交合的一天，而它們一交合起來時，我們就有社會主義了。這個理論沒有看見，在這兩個所謂『木桶』後面是有相當的階級站着，而這兩個『木桶』的運轉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生死的鬥爭，以『誰戰勝誰』爲原則的鬥爭中間進行的。」①